

1934年福建马鼻起义

在福建省连江县东北部有一个叫马鼻的重镇，这里设有国民党政府的区署，驻扎着一支海军陆战队。

由中共福建省连江县委领导的闽东工农游击第 1 支队和农民群众于 1934 年元旦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

在 1934 年 2 月，中共连江县委领导下的闽中工农游击第 1 支队攻占了透堡，并建立了连江县透堡乡苏维埃政府，这是当地第一个红色政权。随后，县委机关迁入透堡，领导建立贫农团等各种革命组织，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各项苏区建设。此时发展壮大为 1000 余人的游击队扩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第 1 支队，下设 3 个支队和特务队，杨而菴任总队长及政委。1 支队还攻克了附近一些村镇，缴了不少的枪支弹药。于是苏维埃政府在透堡、马鼻附近的坑园、龙头、鲤溪等村都建立起来了，轰轰烈烈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或减租、抗捐斗争，苏维埃运动在全县迅速发展。透堡及附近乡村解放后，周围逃亡的地主都躲进与透堡仅六七公里的马鼻镇，马鼻镇成了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2 月下旬，国民党第 18 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并派兵驻连江，也驱走了驻马鼻镇的海军陆战队。马鼻镇各处碉堡、阵地由第 18 路军接管。连江县委根据局势变化，决定趁着海军陆战队撤走，第 18 路军打着反蒋抗日旗号与我求和的有利时机，尽快拔掉马鼻这颗在连江苏区腹地的“钉子”。县委重点做了以下工作：一、通过福州中心市委与第 18 路军交涉，使第 18 路军所部撤出马鼻回县城驻防；二、第 1 支队由杨而菴带领集中在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山面区和透堡一带,加紧训练;二、事先打入马鼻镇民团内部的地下党员迅速摸清了民团实力;四、派人向第 1 路军购买了 1 万发子弹。1 月底,准备工作就绪,县委即从苏维埃各乡抽调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数百人,配合游击总队,由杨而菴带领,分水陆两路,向马鼻进发。

1 月 1 日夜,第 1 总队和由群众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到达马鼻镇外。这时在民团的内应已拆卸了部分团丁的步枪枪栓,策动几个团丁投诚,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1 年 1 月 1 日凌晨 1 点,第 1 总队在赤卫队的配合下,在内应和投诚团丁的接应下,迅速攻占了马鼻镇外围的北分山、关帝庙等山头阵地,接着冲进民团团部,击毙民团团总。经过 1 个小时的战斗,全镇仅横厝街的厚裕米厂尚未攻克,1 多个地主、团丁依仗高楼厚墙进行顽抗。杨而菴率队进攻,不幸中弹牺牲,愤怒的战士们冒着弹雨冲进米厂,击毙了马鼻区长和恶霸等 1 人。

1 月 1 日,连江县工农会代表大会在透堡召开,成立了连江县苏维埃政府。全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有 1 个区、1 个乡、1 个村,在 1 个乡村实行了土地改革,近 1 万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了田地。革命队伍也迅速扩大,1 月 1 日,游击第 1 总队在透堡扩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第 1 独立团。

1937年国民党“围剿”进步电影

1937年,伴随着对红军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国民党当局在文化上也在“围剿”进步电影,可谓“文武”兼施。

第一,运用反革命的政权力量,强化电影检查制度。早在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曾发出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并明文禁止放映纪录和反映抗日内容如《上海战史》、《东北二女子》等新闻片和故事片。1935年上映的一些进步影片,几乎都被删剪、篡改得百疮千孔,带着满身累累刀痕才得以与观众见面。而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不但影片要检查,对电影剧本甚至电影广告的检查都不放过。国民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了“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公布名目繁多的检查“法规”,诸如“电影检查法”、“剧本审查登记法”、“电影检查施行规则”、“电影片检查暂行标准”、“影片期满后复检规则”、“电影广告审查办法”、“电影文字审查办法”等等,内容之苛刻,手段之毒辣,均为前所未见。1937年1月至1938年11月,被禁拍的电影剧本竟达186部之多。

第二,实行文化特务统治,制造紧张恐怖气氛。国民党当局对包括进步电影工作者在内的文化人士下令通缉,妄图削弱进步电影力量。在捣毁“艺华”后,指使暴徒到处寻衅闹事。1937年10月,寻找借口,查抄“暨南”等几家小影片公司,胁迫公司的老板就范,还派遣文化特务到这些影片公司担任名义上的“编剧”,其实从事特务活动,监视、迫害进步电影人士。尤为恶劣的是,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散布反动传单,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叫嚣“铲除电影赤化”不准拍摄和放映“挑拨阶级对立”、“宣传共产主义”的影片,各电影刊物和大报的电影副刊也不能刊载“鼓吹赤化之影评”,否则,就“以炸弹奉饗”。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也赤膊上阵,威胁性地禁映宣传“普罗意识作品”。

第三,炮制反动电影理论,对抗进步制片路线。早在 1940 年,国民党当局便唆使一批御用文人鼓吹“民族主义文学”,贩卖“民族主义电影”理论,宣扬电影应该像日本等法西斯主义国家一样去表现“民族精神”和所谓的“男性美”、“女性美”,企图以此与进步电影抗衡。这一阴谋破产后,又提出了电影创作的最大原则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943 年后,在重弹这些老调的同时,又强调电影“教育上”的“任务”是为“新生活运动”张目,应起所谓“救贫致富”、“起弱图强”的作用。又组织一批帮闲文人,鼓噪“软性电影”理论,打着“电影美学”的幌子,从内容到形式对进步电影展开全面的攻击和污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削弱进步电影的巨大社会影响,把电影创作纳入他们反共卖国的轨道。

第四,拍摄各类反动落后影片,毒害和麻醉广大观众。他们加紧录制反动的新闻记录片,宣传所谓的“剿匪业绩”,颂扬当局的“德政”,向观众灌输反共意识。还摄制了如《妇道》(姚苏凤编剧,陈铿然导演,“明星”影片公司 1943 年出品)和《重婚》(王子陵编剧,吴村导演,“明星”影片公司 1943 年出品)等反动影片。前者配合当时的“新生活运动”,歌颂浸透了封建观念的“母爱”,宣扬了恪守封建伦理规范的“妇道”;后者则极尽丑化农民之能事,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些影片公然为反革命政治服务,因而得到当局的叫号和鼓励。此外,他们还利诱和逼迫民间一些小的影片公司,摄制了大量粗制滥造、趣味低下、庸俗陈腐的色情片、斗打片和歌舞片,妄图用这些“精神鸦片”毒化、瓦解群众的灵魂和斗志,间接地为反动统治效劳。

1939年 德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1月12日，德国和波兰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的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有着复杂的背景，也为德国开始其对邻邦小国的侵略做了准备。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条约只是德国人的一种欺世谎言。

1939年1月，上台不久的希特勒公开表示，要把“波兰走廊”短期内收归德国，引起了波兰的不安。“波兰走廊”是波兰复国后得到的一条通往波罗的海的狭长地带，位于走廊地区的重要港口但泽。根据《凡尔赛和约》和《波但协定》，成为国际联盟保护下的“自由市”，其关税和外交权归属波兰，波兰可以自由使用但泽的港口设施、公路和铁路。但泽在波兰被瓜分后曾几次由普鲁士统治，民族构成逐渐变成以日耳曼人为主，德国在失去但泽后，一直耿耿于怀。希特勒发出侵略叫嚣以后，但泽日耳曼人中的纳粹分子不断滋事，德波边境的形势也十分紧张，两国关系急遽恶化。当时的波兰与法国关系密切，与苏联的关系也不断改善，对德态度强硬。波兰政府命令波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向德国施加压力。

1939年的德国，羽翼未丰，在国际上又十分孤立。希特勒为使德国摆脱受包围的处境，决定暂时改变对波兰的政策，以打开一个缺口。1月，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愿意改变同每一个国家的关系，结束令人伤心的过去。他的话实际上是对波兰说的。1月12日，希特勒接见了波兰驻德国公使阿尔弗列德·维索茨基。在交谈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中,希特勒说,德国绝不用武力改变德波边界。会见后发表了一个两国联合公报,声明反对“旨在损害波兰在但泽的权利和利益的一切行动”。此后,希特勒政府开始执行一种安抚波兰的“新方针”。两国很快停止了针对对方的攻击性宣传,结束了多年的关税战。波兰领导人毕苏茨基和外交部长尤泽夫·贝克被希特勒的和解态度所迷惑。他们认为,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不会像普鲁士军国主义者那样,对波兰怀有刻骨的仇恨,德国对波政策肯定会改弦易辙。他们抛弃了亲法联苏的外交政策,转而奉行一种所谓不偏不倚的“均势政策”。1938年9月,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期间,贝克和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就进一步改善波德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谈判。

1938年9月15日,希特勒约见波兰新任驻德国公使利普斯基,再次表达了德国的“和平”诚意。会谈结束时,两国再次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用直接谈判的手段来解决“共同有关的问题”,两国“为了巩固欧洲和平”,决定在相互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11月15日,应德国方面的请求,毕苏茨基接见了德国驻波兰公使莫尔特克。会谈时莫尔特克向毕苏茨基递交了一份德方草拟的德波互不侵犯宣言草案。两国开始以此草案为基本依据进行谈判,两个月后,即1939年1月18日,德国外长牛赖特和波兰驻德公使利普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柏林签署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全称《德国和波兰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1月18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互换批准书后生效。条约规定:两国政府承担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双方将通过协商解决相互间的关系问题。条约有效期为5年。条约签订后,双方的公使馆即升格为大使馆。在以后的几年里,波兰政府执行了亲近德国的外交政

1939年的故事

策,公开支持德国扩军备战和侵吞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1939年4月,波兰参加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占领了一部分领土。

然而德波关系的“好景”并不长。1939年,希特勒宣布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源法国斯塔维斯基事件

1933年11月10日, 诈骗犯斯塔维斯基之死引发了法国的一次“大地震”。法国法西斯分子的趁机暴乱几乎让法国陷入完全混乱。这一事件有着深层的背景。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法国以沉重的打击, 造成社会动荡, 政局不稳, 民众生活困苦, 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满, 尤其对政府要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现象表示愤慨。在这种状况下, 法西斯主义抬头, 各种法西斯组织乘机活动, 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攻击政府, 号召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当时法国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是以拉·罗克上校为首的十字团。这个组织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 并拥有大量武器, 其成员经常身着戎装, 头戴钢盔和佩戴各种勋章在大街上游行。此外, 还有法兰西行动, 法兰西团结, 爱国青年等法西斯组织, 它们也经常举行游行活动, 向政府示威。就在人民群众不满情绪上升, 法西斯分子猖獗的时候, 1933年11月报纸披露了斯塔维斯基诈骗案。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是白俄后裔, 他在巴荣纳市创办了一家信贷银行, 发行虚假股票, 诈骗了1.5亿法郎。他的投机活动使数千名小存款者丧失储金。斯塔维斯基为了自身的安全贿赂了100多名政客, 其中包括10名议员、巴荣纳市市长和1名共和国检查官。当投机活动败露, 信贷银行破产时, 斯塔维斯基逃之夭夭。11月10日, 人们在夏蒙尼的一座小别墅里找到了斯塔维斯基的尸体, 警官宣称他是自杀身亡, 但人们普遍认为是谋杀, 其目的是阻止丑闻的进一步宣扬, 以庇护卷入其中的议员和

政客们。这一事件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愤懑，肖当内阁在丑闻中垮台。

然而，法西斯分子并未善罢甘休，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发动进攻，建立法西斯政权。法西斯分子在许多城市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打出维护人民利益的旗号，指责各资产阶级政党出卖人民利益，不配领导政府，应该立即下台，由他们管理国家。圆月 远日，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法兰西团结等法西斯组织聚集了圆万多名法西斯分子手持棍棒涌上巴黎街头，在“向议会进军”的口号下向议会大厦前进。当时，议会正在召开会议，法西斯分子打算冲进议会大厦和其他政府重要机关，占领社会大厦，逮捕内阁成员及其他政府重要成员，建立法西斯政权。最初，达拉第政府不敢对法西斯分子采取强硬措施，致使法西斯分子气焰嚣张，步步紧逼议会大厦。这时，法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带领人民群众同法西斯分子展开激烈搏斗。当法西斯分子呈现不支状态时，达拉第政府才命令警察出动，与人民群众一起驱散了法西斯分子。

圆月 远日法西斯分子的暴乱对法国政局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圆月 苑日，达拉第内阁全体辞职。圆月 愿日，前总统杜梅格上台组织政府，成立了带有中间色彩的民族团结政府，它致力于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等党派也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的严重性。共产党和社会党分别于圆月 怨日和圆月 愿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不久，共产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在圆月 远年取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人民阵线政府取缔了法西斯组织，阻止了法西斯分子夺取国家政权的阴谋。

缘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员年 员月 员日 国民党军对福建人民革命军发起总攻 相继攻占延平和古田 福州危在旦夕。员月 员日 福建人民革命军放弃福州、白沙、大湖之最后防线 开始分两路向漳州、泉州撤退。员日蔡廷锴在泉州召开紧急会议 决定本人离军去闽西 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闽西保存力量 凡不愿西进者自由择定 宣布将一方面军部队归毛维寿指挥。随后 蔡派副参谋长范汉杰率高级参谋陈心慕往厦门与蒋鼎文接洽 说明蔡已离军 愿和平改编十九路军。员日 国民党军占领漳州 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等向蒋军投降 在泉州通电脱离福建人民政府。员日 蒋介石复电照准蒋鼎文拟定收缩十九路军办法 营长以上离营 余则点械收容 并令十九路军集中莆田、福青、惠安听候改编。次日 蒋鼎文电泉州十九路军将领限猿日内明白表示。沈光汉等复向蒋介石要求仍驻泉州并保留十九路军名义 另派戴戟来闽负责改编 至缘日晚仍未开出泉州。蒋未允 仍以重兵压迫 准备武力解决。沈等只得表示听命调动 遵令候编。猿日 蒋在泉州任命毛维寿、张炎为东路军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 统率所部。同日 毛张二人在惠安通电就职 十九路军被取消。圆月 圆日 蔡廷锴所率十九路军残部为陈济棠收编 改为粤军独立第三师。圆月 远日至 苑日 在莆田、惠安、福清等地原十九路军 圆万余人 被宋希濂等师全部缴械。下级军官分送南京、洛阳两军校受训 全部士兵分驻开封、归德等地 交河南刘峙整训 猿个月后分发各部队。

其时,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福建人民政府事件。

1月16日,第十九路军与蒋军战事危急时,毛泽东、朱德致电福建人民政府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提出六项紧急建议,敦促“应立即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允诺的人民民主权利”,“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合作到底,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与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

1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说,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再次证明在全中国民众面前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道路,或者是坚决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寻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要遭受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同时断言:“一切改良主义者的第三条道路的找寻,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借口与把戏,而实际上,他们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

1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发表第三次宣言,略述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协议联合反蒋抗日经过,认为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只在口头上宣布一些“左”的改良主义政纲,在军事上采取失败主义路线,在群众运动上不仅未给民众以民主权及武装民众,反而予以限制。宣言再次声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军事委员会决不因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而放弃愿在过去三条件下与任何抗日反蒋军队订立协定的提议。指出只有全中国抗日反蒋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卖国政府。

远罗、南、希、土签署巴尔干公约

圆月 怨日 欧洲的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签署了《巴尔干公约》。这个条约是在欧洲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出台的，后来由于复杂的国际外交而遭废弃。

员 怨 年和 员 怨 年 通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签订的一系列和平条约 改变了巴尔干地区的版图。战败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分别把一部分领土割给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捷克斯洛伐克和土耳其。保匈两国对此耿耿于怀，一心打算修改和约，夺回失去的领土，与南、罗、希、土等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英国、法国、意大利趁机介入这一地区，竭力扩大自己的势力、排挤各自的对手。在法国的支持下 员 怨 年和 员 怨 年 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相互间签订盟约，组成“小协约国”。英国则在希腊取得了支配地位，意大利不断拉拢保加利亚。英法两国最初矛盾重重，目标不一。英国试图促使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签订一个所谓的巴尔干“洛迦诺公约”，便于英国通过希腊控制巴尔干，法国则想把保加利亚拉入“小协约国”体系。员 怨 年 员 月，希腊和南斯拉夫开始谈判，到 愿 月 员 日 两国在雅典签署了一个友好合作条约，完成了英国计划的第一步。法国在 员 怨 年到 员 怨 年间，先后与土耳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签订友好条约，争取保加利亚的合作。但是保加利亚既仇视希腊，又因支持南斯拉夫国内的地下组织而与南政府不和，英法的目的都无法达到，希腊议会也未批准希南条约。

由于土耳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英国决定先推动希腊和土

耳其接近,同时避免土耳其完全倒向法国。经过紧张的活动,1913年10月14日,希腊和土耳其签订安卡拉条约,双方承认领土现状,相互保证边界不可侵犯,在东地中海地区保持海军均势,还规定对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应进行协商。意大利为了能与法国在巴尔干抗衡,与英国站在一边,鼓励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建立三国联盟。法国对此坚决反对,打算向英国妥协,努力使巴尔干各国订立一项对维护和约有利的公约。1913年初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修约的另一鼓吹者匈牙利开始寻求德国的支持。匈牙利首相亲自赴德国活动,与希特勒举行会谈,公开宣布匈牙利支持一切主张修改和约的国家。面对来自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越来越高的修约呼声,罗、南、希、土等国开始谋求签订一项联合协议,共同维护战后领土现状。在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下,由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发起,各国开始为缔结公约积极准备。英国和法国也亲自出面,1913年12月邀请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访问巴黎和伦敦,希望保加利亚参加即将拟定的公约。但保加利亚的答复是,只有结束马其顿现有的分裂状况,保加利亚才能加入公约。换言之,必须先让南斯拉夫归还保属马其顿,南斯拉夫政府对此当然无法容忍,反对邀请保加利亚参加。1913年12月15日,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雅典签署了《巴尔干公约》。主要内容是维持各国现状,反对修改战后疆界;缔约各国相互保证巴尔干地区现有领土秩序和全部边界的安全,如果遇到破坏本协议规定的行为时,缔约国应协商采取共同的应付措施。

参加巴尔干公约的源国不久以后形成了一个亲英法的地区性组织,拥有常设机构,并按照规定定期召开成员国会议,协调各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公约的签署引起了希特勒德国的不安,它被认为是在东南欧遏制德国的重要手段。德国开始把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结合起来向巴尔干渗透,设法离间公约各国,使它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们逐步背离英国和法国。1938年 缘月,纳粹党的重要人物戈林访问南斯拉夫,签署了德南贸易条约,南斯拉夫向德国出口的原料迅速增加。1938年 员月 怨日,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访问法国,在马赛被德国指使的法西斯分子刺杀,使巴尔干公约失去了一位坚定的维护者,也使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摄政的保罗亲王放弃了传统的亲法政策,转而与德国、意大利逐步接近。德国与南斯拉夫的贸易额不断增长。1939年 远月,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访问南斯拉夫,两国再次达成贸易协议,德国表示愿意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南斯拉夫的原料。同一年,德国向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经济渗透也取得较大进展,德国把土耳其对外贸易总额的半数集中在自己手里,同时成为(罗马尼亚)主要输出品的最大顾主。

1939年 愿月,德国政府联合波兰政府向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施加压力,迫使力主维护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公约的罗外交部长蒂图列斯库辞职,改由主张对德修好的安东奈斯库出任外长。在德国的撮合之下,1939年 员月 圆日,南斯拉夫和亲德、意的保加利亚签订了永久友好条约。猿月 圆日,南斯拉夫王国首相斯托亚丁诺维奇同意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友好条约。1939年 源月,罗马尼亚政府向波兰政府保证不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缔结互助条约。1939年 员月,斯托亚丁诺维奇访问德国,亲口向希特勒保证,南斯拉夫将会“信任”德国,保持同德国的“友谊”。随着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集团,英法绥靖政策的失败和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灭亡,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争相讨好德国,到 1939年,巴尔干公约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

左翼电影界的反“围剿”

反革命文化“围剿”在电影领域内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压制进步电影界人士。左翼电影界人士奋而起之，有力回击。阳翰笙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党在电影界的政策，是“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搞统一战线”。电影界的反“围剿”斗争也正是从这三方面进行的。

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措施和白色恐怖政策给左翼进步电影创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尤其是党的电影工作者此时已不能公开活动，他们的作品无法搬上银幕。为此，采取了更为隐蔽与巧妙的方法，即由个人出面联系，继续为影片公司提供剧本，并且在片头隐去剧作者的名字，而让导演兼编剧，以便于通过检查。在与国民党当局的周旋中，革命的进步的电影剧作者逐步提高了斗争艺术，既让影片宣传革命进步思想，又不直露显眼；既能避过检查官的眼睛，又要使广大观众心领神会。这的确很不容易。但是，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广大进步电影工作者仍是“学会迂回曲折地表达我们思想的本领”。在改变斗争方式的同时，尽一切可能保持原来的阵地，坚持斗争。1934年12月前，原“明星”编剧委员会利用了种种有利条件，在隙缝里继续进行进步电影创作，致使一个时期之内，“明星”的出品中，好的或比较好的影片还是占了优势。在“艺华”影片公司，也争取到老板的合作，保证了进步电影的拍摄。另外，还开辟新的阵地，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趁国民党当局一时不明底细之机，拍摄了一批进步影片。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在电影理论战线上,组织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评论队伍,及时介绍和评论当时出现的进步电影,扩大这些影片在群众中的影响。对在国民党操纵下拍摄的反动影片如《妇道》、《重婚》等,则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们宣扬封建道德、反对阶级斗争、为国民党效劳的反动实质,肃清它们在观众中的流毒。对于国民党鼓吹的拍摄“新生活电影”、“建设电影”等谬论,左翼电影评论也给以尖锐驳斥,粉碎了他们企图把电影创作引向反革命政治轨道的阴谋。从1935年起,对鼓噪一时的所谓“软性电影”论,进行了一场规模颇大的讨伐,大大打击了反动电影理论的嚣张气焰,壮大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声势。

为了扩大左翼进步电影的影响,更有力地开展反文化“围剿”的斗争,还狠抓了电影队伍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一些电影公司老板一方面慑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对于拍摄进步电影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进步电影备受观众欢迎,出于赢利的考虑,又有愿意与左翼电影工作者合作的要求。充分掌握了老板们的这种心理,党的电影工作者便尽可能地团结、争取他们。在“艺华”,田汉等人就是这样做的。在“联华”,则利用老板罗明佑与吴性裁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了二厂上层分子的合作。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左翼电影运动在重重压迫之下顽强地生存下去创造了条件。电影领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重点是编、导、演,从思想上去影响一批党外和电影小组以外的朋友”,与他们肝胆相照地交朋友,“提高他们在电影界的地位,在群众中的声望,以及在老板面前的分量和作用”。结果“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能够把资本家在上海所办的五大电影公司里的大多数编、导、演团结在我们周围,并且使中国的电影事业能够在党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和影响下,沿着反帝反封建的道路走下去”。

电影领域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一直持续到1935年底。这是一场复杂而又艰苦的韧性战斗。在这场斗争中,国民

1935年的故事

党当局绞尽脑汁,施展了一切可以施展的反动伎俩,给左翼进步电影运动造成了无数困难和损失。但是他们无法遏止电影界的革命潮流,广大进步电影工作者团结在党的电影工作者周围,以惊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勇气,巧妙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进步电影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迎来了开展爱国进步电影运动的新战役。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